

21001

大邑文史资料 选辑

政协大邑县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

目 录

铁马金戈当年事 情真意切忆故人

周戈西

马支沉录音 沈洪民整理

忆亡友李惠民烈士

卢吟龙

烈士刘鸣皋生平简记

白开茂

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姚雪岩

铁马金戈当年事 情真意切忆故人

——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大邑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 戈 西

(马支沉录音 沈洪民整理)

我是大邑王泗乡人，从小外出读书，年轻时参加革命。我哥周鼎文在大邑搞地下活动出了名，反动派要缉捕他，常年奔跑在外。我较多的活动是在成都、重庆、新津、邛崃、雅安、名山和芦山等地。但也常回大邑，干过和了解一些事。现作个简单回忆。

从我亲历体会，我们党能取得革命胜利，主要一条经验是密切联系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坚定地开展革命斗争。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跟着肖汝霖同志到大邑安仁镇，住青年学会里。后来我在安仁小学碰到王民主、黄建潮、戴万泽等人。王民主，真名王寿堂，因他赞成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反对蒋介石

专制独裁的主张，所以被同志们给了这个雅号。他是安小的教导主任，有一批青年学生受他影响走上革命道路。这个安仁小学是党在大邑开展地下斗争的一个据点。

我一生敬佩过两个大邑人：肖汝霖二哥和李惠民李姐。他们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中，英勇顽强、出生入死，对党的事业披肝沥胆，最后为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流尽了血。想起他们，心里总忍不住难过。一九四六年正月初二，我同李姐由成都转移去重庆，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李姐被捕，将近两年半，我基本上没离开过她。

重庆“四·一二”事件后，我到了成都。中共雅乐五委副书记吕英(化名刘丹)布置我注意在成都物色点素质好的大邑人，经过短期训练，派回原籍充实革命队伍，开展群众工作。六月，为此事我到安仁小学问王寿堂：“你在成都有些啥关系？介绍几个大邑的吧！”王寿堂讲了彭致皋、沈洪华、郑循林、余成安四人。这都是他教过和靠得住的学生。他还开了条子要我先去找沈洪华。沈洪华在成都汇通银行黄门街储蓄部作见习生。我找到了沈，然后同他去大成金号找到彭致

皋。彭致皋是金号作坊里的学互。经彭介绍见到郑循林和余成安。郑、余二人在上中东大街克胜银行当练习生。他们全来自大邑农村，对贫苦农民的穷困境遇，自是深刻了解。我组织他们成立起小型的读书会，利用夜饭后和其它空闲，在沈洪^华住地，帮助他们学习、传阅《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进步书报，启发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树立爱国反蒋觉悟。他们学得很认真，只个把月就大见成效了。吕英同志听我汇报了他们情况后，叫我动员他们回大邑农村干革命。四个人中沈洪华、郑循林和余成安回去了。沈洪华安排在安仁小学当教师。这身份，是适合搞群众互作的。因他表现好，很积极，当年十月由组织吸收入了党，以后游击队成立，沈洪华成了骨干。

九月二十五日，我接受任务从成都去了安仁，住沈洪华同志家。当夜，附近响起枪声。第二天一早，王寿堂跑来流着泪说，肖汝霖二哥昨晚被刘文彩用滑竿捆抬去县城路上，在王么店子遭刘文彩兄弟伙枪杀，徐达仁同志也同时遇害。这十分不幸的消息，弄得沈洪华和我连早饭也不想吃。没多久，吕英同志赶来，这是我们事先约定在这里碰头听他安排互作的。我们

忍着悲痛先让他吃了一碗蛋炒饭，然后才告诉他肖、徐被害的事。吕英闷了一阵，毅然说：“改变计划，你暂不留大邑搞武装了！”他从衣袋里摸出纸条，写下“周菊英”和“小方”等字交我带好由沈洪民陪着送到唐场，我在这里乘船到新津，接上关系进了普育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搞了一阵活动。

现我讲几位熟悉的人。先说彭致皋吧！他是根据吕英意见决定留成都另行安排任务的。彭致皋一九四四年去成都大成金号。大成金号在城守东大街七十六号，这地方很闹热，外有马车站，对门有掬春楼茶馆，行人很多，川流不断。金号为一楼一底，楼下铺面，楼上作坊。彭致皋住楼上。两位师父在成都有家，下班后各走各的，要第二天才来干活；天黑彭致皋将店门一关，整个楼房，便成了彭致皋一人的“天下”。金号老板牛晋权，经理马子清，平时很少来，来了也不久停，无非理抹过问一下便走。不用说，这样的地方，是适宜党的秘密活动的。比如从贵州、重庆、遂宁等地过来的陈濂、高绮琴、唐曦、彭先容、邓明秋、邓念秋数十位同志，都是先来金号与彭取得联络，由彭向组织汇报才被分派去各地的。张澜女儿张淑延给

党寄的活动经费，也是通过彭致皋收转的。格外，彭致皋还搞掩护，由于大成金号保险安全，有的同志甚而是党的负责同志也常来这里过夜。吕英同志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多，一向很谨慎，他就看得起彭致皋这块地方。临到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晚上，他白天大概发现了什么，向我说天黑决定睡彭致皋处，要我先去《西方日报》社门口等他，但他刚离开几步就转身回来对我说他不去彭致皋那里睡了。我现在想，如果吕英同志不临时更改主意，也许不至于遭敌特逮捕而牺牲。

吕英同志被捕，王愈文同志跑到三桥南街陈玉堂家门口，大约想来弄清和证实什么，恰好我和彭致皋都在。我当时不认识王愈文同志，尤其她来时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和不伦不类的样子，我怀疑她是特务，立即叫彭致皋给她跟起，彭毫不犹豫地跟她大半天，绕了十多条街，结果跟脱了。

彭致皋还接受跑交通的任务，凡遇紧急事，就派他出马。他曾去过邛崃石子坡、双流擦耳岩，没出过问题。记得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把一只装了武器的箱子锁了，叫彭致皋化装成学生将箱子送到双流擦耳岩

徐茂森同志家。他雇一辆黄包车，坐着去了。待他完成任务回来我才说箱内装的是折散的机关枪。他吓得一跳：“哎呀！你咋不先讲清楚，万一被在武侯祠外站岗的宪兵查出来，咋个得了啊！”

成都三桥南街陈玉堂家也是我们开展地下互作的联络点，来去的同志不少。有些事需人应付，彭致皋也常去帮一位叫二娘的买菜、买米、烧火、煮饭，忙这忙那，以至同志们换下脏衣服，彭致皋也争着帮二娘洗。彭致皋就那么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干了许多有利于党的事。多好的一位同志啊！

我要讲的第二位是卢吟龙。在大邑，恐怕唯有我比较了解他。解放前，卢吟龙是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司库，又是联隆股份行总经理。安徽灵璧人，原叫卢文龙，毕业于中央互业专科学校。抗战胜利，重庆飞来寺原苏联驻华大使馆迁南京他家就搬进去了。里头有假山、溜冰场、游泳池，漂亮得很。一九四七年，李惠民姐读四川大学，是学生会负责人。一次学潮中，她发表演说揭露蒋家王朝压迫人民的罪恶事实，受到特务监视，组织决定她转移。五月，李姐带着我去重庆，就住这个公馆里。原因是卢吟龙的夫人杨慧是李

姐读大邑女小、女中、省女师时的老同学。她们比姐妹还亲。李姐读川大时，杨慧资助不少钱。这次来重庆，李姐对他们夫妇说她来找互作，我是来读书的。不久，李姐通过大邑人杨修平在鱼洞溪松花江中学当校长的关系，以教书为掩护在重庆活动，我们就搬出去住了。但我们还是常去卢吟龙夫妇家，给他们阅读进步书报，讲时事形势。虽未向他们挑明真象，但他们也似乎晓得我们是干啥的了，很同情、支持和关心我们的一切。我们曾约集一些同志在他家秘密开过几次会，他俩夫妇从不阻拦，还提供方便。李姐去江北歌村活动需用钱，以至江竹筠需用钱，也是通过李姐去向他们要的，只是他们不知江姐其人罢了。在重庆半年多，他们夫妇送给党的活动经费，不少于六、七千块银元。

卢吟龙任职的联隆行，经营的是棉纱、黄金、白银、美钞的存放。当年十二月，该行董事长石孝先贿选国大代表，拐走大量黄金，联隆行因此倒闭，弄得卢吟龙难脱手。石孝先是兰社总社长，其父石青阳任川军师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重庆的势力大，卢吟龙咋敢惹？逼得另打主意，带上杨慧和孩子乘汽车

跑了。车至重庆南岸土桥，碰巧遇上李姐和我。卢吟龙停车对我们说，董事长把钱拐走，联隆行垮了，我受连累，得走啊！卢从皮包里取一张支票，开了上万元的数，递给李姐说，赶快去道门口中国农工银行取，我一个同乡在那里，迟过今天就不要取了。随手又交给李姐两百元现金，开车走了。这算是卢吟龙最后一次赠给党的经费。这张支票由李姐交集华中学一个人称古典美人的女的去取。她胆小。我说：“让我去取！大家笑话说：“你又黑又瘦，像不像有钱人！！”这张支票，终于作废了。

后来了解，卢吟龙一家人跑过遵义至湄潭途中，石孝先派人开车追来，将他一家挡回遵义，他乘人不注意，又溜了。只杨慧和孩子被送回重庆。杨慧根据卢逃走前留下的帐单理清债务，带上孩子回了大邑娘家。

卢吟龙从遵义绕小道，插金沙、黔西，跑拢毕节。在旅馆里喝醉酒骂国民党，被店老板告发，川黔东警务段段长刘尧把他当成异党份子抓来关进毕节专署。卢贴身带的五十两金条也被搜去。晚上，专员周希濂亲自审讯，用了电刑。卢吟龙招架不住，交代了真情

专署向重庆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理，重庆方面以为卢已没多大油水可榨，不予回话。贵州省主席杨森获悉此事，回电说将卢就地处理。一九四八年四月，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周希濂也调任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周赴任前支使副官向卢索贿，卢吟龙照办，才被释放，沿途吃了许多苦头，终于到了大邑。以后在城内南街开了个布店，招牌名叫“天合生”。他是生意场中内行，重实际，讲信誉，据说临近大邑解放，他已是拥有一定资产的富商了。

大邑解放后，卢吟龙对党和政府是热诚拥护的。曾任大邑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第二、三届副主席，出席川西区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任过大邑县互商联筹委会主任、县中苏友协筹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带头创办大众厂（即现在的“五一染织厂”）。卢吟龙年轻、有能力，又是大学生、会说话、会办事，社会上渐有名望。

卢吟龙是很讲情感的。当他们夫妇得知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李惠民惨遭杀害的消息后，即主动将烈士的母亲与大姐李惠贤接来和他们同住，细心照料，朝夕相伴，替李姐尽了孝。

我要讲的第三位是安仁廖水碾的廖善勋。他是我读雅安中学时的同学，又是同乡，友情自然好。后来他在成都读书又碰上我，经我多次接触，他知道我正干些什么。一次他对我说：“我赞同你们那些主张，可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干。我出钱，你们需用多少，尽管说！”又一次对我说：“你们干的那些事和你们住啥地方，绝不要对我讲，万一我被抓起来，吊鸭儿浮水，整得我实在受不了，耽心要招出你们的；我不晓得你们的事，就是整死我，招也招不出真的啊！”他有一个堂兄廖善保，在成都成益银行当襄理，我几次提出要钱，都是廖善勋把支票一开，我就去那里如数取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党组织缺钱买武器，我找到廖善勋说：“又要钱了，想办法吧！”他爽快地答应把他家在崇庆县安顺乡的水田卖了。这事是后来交王寿堂、李仲乾二人办的，共卖四百五十六个硬洋，由杨太德同志送交邛崃石子坡王用材处，买了枪支弹药。可惜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因染上过不良嗜好，身体虚弱，大邑解放不久便离开人世。他不能多看到中国建设的新成就，遗憾啊！

我还该讲讲地下时期被一些同志称作“民主妈妈”

的廖张氏，也有人叫她廖二娘。她原是大邑龙凤乡皂角嘴人。一九二五年与廖甫堂结婚后，生了老大廖善勤，老二廖善明。一九三一年丈夫病故，家里虽然有钱，但在刘家伸手遮天的安仁镇，这位守寡多年的妇女，也显得势孤力弱，常受歧视和冷眼。随着我们的接近，她也从同情革命进而积极支持革命。一九四九年，党组织加强安仁、元兴等乡的地下互作，廖二娘家成了又一个联络点。杨太德、蔡曦和好几位同志都来这里住下开展活动。对于来往于她家的同志，廖二娘犹如母亲待儿女一样给吃、给钱用，亲手给同志们缝缝补补，也支援活动经费。当同志们反映她希望会见地下党负责人的心愿时，周鼎文就特意去拜望。感谢她对革命事业出了力，向她讲革命道理，对她鼓舞很大。解放后，廖二娘也出席了川西区和大邑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安排为大邑县政协委员，在参加安仁镇的合作商业互作中，受过奖励、表扬。一九七六年病逝，活七十七岁。至今我们一些同志回顾在大邑的战斗经历时，总不免要念到她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在大邑“二五减租”斗争中，打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贴心管家陈老典那仗，算是出色的。最近，重

庆市江北县党史办派两位同志来大邑上安、元兴、三岔、王泗和名山县搜集唐曦(江北人)烈士的革命事迹，访问了许多知情人。在温江，他们访问了黄文祺，又来找到我。他们说，这次出来跑了二十多天，感受太深了，像大邑这样的“二五减租”斗争，场面之广、群众之多和情况之激烈，是其他地方少有的。他们向我讲起三岔乡农民打陈老典的场面。那天陈老典带一帮背枪擗炮的队伍，抬一架装链条的风谷机，气汹汹的赶到三岔乡侯墩子，满以为收租不成问题。那知周围团转的坟园头、竹林头，一下子就冒出好多手持棍棒刀枪的农民，把陈老典紧紧围倒，唐曦和黄文祺站出来，理直气壮，讲了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罪恶，陈老典开头仗恃有刘总办撑腰，把他怎样不了。他那里想得到，经过党教育、团结的农民群众，人多、心齐、力量大，吼的吼，闹的闹，人越来越多，越围越紧，拳头、扁担直朝他面前晃，狗腿们说话也抖不清，结果陈老典耙了，蔫妥妥地连连答应“减租、减租”，然后夹紧尾巴，开趟子溜了！

敌人围剿“二五减租”的阴谋是怎样被我们知道的。大邑展开“二五减租”斗争时，组织上决定我留

在成都。一天，吕振修同志找到我，样子很着急，说他刚在杨雨楼家，听大邑的冷曝东说，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孟广澎说，省主席王陵基已决定派三个保安团前去大邑剿杀共产党。时间紧迫，我骑上吕振修的自行车，很快向中共川西边临工委作了汇报，在组织决定下，大邑的同志、群众及时撤退、转移隐蔽，避免了较大的损失。也有的同志在敌人疯狂围剿时，不幸被捕，壮烈牺牲了，如田载重、萧国珂、刘鸣皋等人。

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解放大邑战斗的有大渡河支队、岷山支队、崇大新支队、斜江支队和名雅支队。我是名雅支队的指导员，实际止还没上任就调到纵队部当情报股股长。所以在打大邑仗，名雅支队主要是高有思和另几位同志在指挥。这个支队当时分住在王泗乡下的伍家寺、罗万寺和孟鹤松同志家（纵队部驻王泗街上）。他们在罗万寺、三岔街、潼桥、固驿镇、周家大院等处与国民党军多次激战，共缴获机步枪三百余支、子弹无数。上次，我到名山，看望老战友高有思，一起回顾往事。他告诉我，名雅支队在大邑、邛崃交界地的大小战斗，共俘获国民党官兵四、五百人。国军士气低落，一听游击

队喊“缴枪不杀”，他们就举手投降。在邛崃潼桥乡打胡^宗南的新一军很艰苦。这个军号称“天下第一军”，是胡宗南主力，武器优良、弹药充足。战斗中名雅支队的那杆旗，被敌军机枪打得稀烂，名雅支队的战士们没有怕，紧紧把敌军逼下冬水田，等解放军赶到，一齐夥着打，敌军全完蛋了。

我担任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部情报股长，主要任务是审讯和处理俘虏。审讯的目的是搞情报。凡抓到营以上的军官，都要审，弄清、掌握敌军动态，向纵队部汇报。处理俘虏本不该我们管，但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把这事交给了我们。所以，当游击队在王泗捉到胡宗南二十一军残部一大堆人时，我去讲了话，交代了政策。俘虏们提了两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他们疲于奔命，马路边、沟坎边，一倒就睡着，到处都是。情报股虽只几个人，但我们还是设法筹粮，让俘虏和他们拖着跑的妻室儿女吃饱饭。我们是认真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打王泗下来，游击队进驻大邑县城，弄到了一个情报——军统少将级特务、重庆特刑庭庭长熊本立窜入大邑县境，收集散兵游勇，成

立所谓的新十二军，搞假起义，企图伺机反扑。我在重庆就晓得熊本立。这个杀害革命志士包括李惠民姐在内的刽子手，够得上罪恶累累的大坏蛋。冤家路窄，撞到我们手里了，无论如何要抓住他，决不能让他跑掉。经继续侦查，进一步弄清和熊本立裹得紧的二十八个人，全是军统特务。趁他们沿途招兵买马、任意封官的机会，我派情报股的吴玉书同志伪装打了进去。吴玉书还捞了个“营长”的官衔。当这夥特务从苏场出发，天黑歇十里场时，我们收到吴玉书巧妙送出的情报。我带人迅速赶去，一个不漏将他们抓回大邑县城。组织决定，由我负责押送成都。纵队部张旭中同志给我开了盖着游击队大印的介绍信，让我直接交李井泉，结果只见到他的秘书长王定一。王定一叫把这帮人交军管会公安处。公安处领导要我留下不走，我不干，再三推不脱，只得留下了。

至于吴玉书，也一同当“特务”关起，不暴露他的游击队员身份，让他搞狱侦，看这夥人怎样串供。任务完成后，吴玉书出来了，理了发，洗了澡，被分配到温江军分区作特务连连长。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日，成都市人民法庭在成都